

经济·社会·宗教

上海

163

版社

·名人名著译丛·

# 经济·社会·宗教

## ——马克斯·韦伯文选

郑乐平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名人名著译丛·

# 经济·社会·宗教

——马克思·韦伯文选

Jingji · Shehui · Zhongjiao

郑乐平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敏

经济·社会·宗教  
——马克思·韦伯文选  
郑乐平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70000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618-312-4/G·57  
定价:11.00元

## 前 言

如果说康德是通向当代哲学的一座桥梁,对每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将韦伯喻为通往当代社会学的桥梁,想必社会学家们亦不会提出异议。

韦伯的思想博大而精深。说其博大,是因为他的研究横跨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社会等诸多领域;说其精深,则是因为他能够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给予条分缕析的回答。

韦伯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当我们随着他的思路向前走时,犹如追逐着一匹脱缰的烈马,在广袤的原野上驰骋,一不小心会找不到回家之路。然而,在韦伯众多的论著中,有两个重大问题是他所孜孜以求回答的:其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重要因素。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16、17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一个极重要的思想与精神因素。其二是,为什么一个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文化只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韦伯的答案是:“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

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sup>①</sup>

然而,韦伯一方面认为在西方,这种理性化(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进程是不可规避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以人类文化和个人生活自然情感的萎缩为巨大代价的,这就使他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持有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态度。

韦伯自己曾说过:“个人学术的命运,十年、廿年、五十年就过时了”,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韦伯逝世已半个多世纪了,他的著作还是社会学者案头不可少的,大家还是忘不掉他。……他的经典之作,后人总能不时地回去‘重访’,寻求启发与灵感。韦伯的著作已公认为社会学中的经典,早已构成社会学的核心传统了。”<sup>②</sup>不少社会学家正是从研究和发展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而成为一代大家的,如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帕森斯,当代的社会学大师E·哈贝马斯、A·吉登斯和J·亚历山大等。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贵在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16页。

<sup>②</sup> 参见金耀基:《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辽宁教育1995年版,第134页。

(如韦伯上述所提出的两大问题),然而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之形成,并非凭空而来,它有赖于丰厚的个人知识,“用波拉尼(M. Polanyi)的哲学术语来说,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sup>①</sup>而形成这种“支援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大师原典的认真研读。从思想史,尤其是社会学史的角度来看,韦伯的著作[特别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堪称是“有深度、浓度与涵盖广的经典巨著”(林毓生语)]。当然研读大师的原典,并非是接受其现成的结论,而是要探究其思维的方式、研究的路径或取向,以拓展我们的视野,进而能够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及其答案。

郑乐平

于 1996 年岁末

---

<sup>①</sup> 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9 页。

## 目 录

---

- [ 1 ] 前言
- [ 1 ]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
- [ 5 ] 宗教改革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 [ 12 ] 犹太教与资本主义
- [ 19 ] 犹太教徒的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的禁欲主义
- [ 32 ] 佛教的出世及其经济后果
- [ 38 ] 耶稣对俗世的冷漠态度
- [ 44 ] 修道生活的宗教-卡理斯玛功业与理性的功业
- [ 48 ] 大师宗教与大众宗教
- [ 50 ] 教权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68 ] 教权制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时代中的地位
- [ 72 ] 宗教与经济
- [ 76 ] 世界“图象”的合理化
- [ 81 ] 东西方救赎宗教之差异
  
- [ 90 ] 宗教与性爱
- [101] 宗教与审美

- [105] 论中国士人阶层  
[112] 论社交生活  
[114] 婚姻与命运
- [116] 近代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先决条件  
[119] 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135]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  
[137] 计算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  
[146] 家族发展之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因素  
[153] 市场:它的非人格性和伦理(残篇)  
[161] 城市的概念与类型  
[169] 论城市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172] 论市民
- [180] 论一元化的官僚制  
[185] 论合理的国家  
[191] 论卡理斯玛权威  
[199] 支配与合理性  
[204] 宗教与政治



##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sup>①</sup>

所谓“世界诸宗教”，我们指的是如何将信徒大众聚集起来的五大宗教或由宗教所制约的生活规制体系。在这里，我们完全是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宗教伦理都归属于世界宗教的范畴。除了以上诸宗教外，我们还将涉及第六种宗教：犹太教。

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其涵义将随着我们论述的展开而逐渐明晰起来。我们并不将论述的重点集中于神学纲要的伦理学说上，因为即使这类纲要在某种情况下多么重要，我们也仅仅将其作为认知工具。“经济伦理”指的是植根于宗教之心理的和实际的背景中的现实冲动力。以下的论述也许是十分粗略的，却也足以显示出一种具体的经济伦理通常在结构上是多么复杂，其制约条件又是多么纷繁多样。而且还会进一步显示出外表看似雷同的经济组织可能会与极为不同的经济伦理相结合，并且依照其经济伦理的独特性格，这类经济组织又怎么会产生出极为不同的历史结果。显然，经济伦理决非经济组织形态的一种简单“函数”，反之，我们也不应当认为，经济组织形态毫不含糊地是由经济伦理冲压出来的。

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完全是由宗教决定的。尽管就人类对世界的态度而言——这种态度是由宗教或由其它

(在我们看来)“内在的”因素决定的——经济伦理当然有其高度的自律性,但既定的经济地理和经济史诸因素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高度的自律性。不过,宗教之对生活品行的决定作用也是经济伦理的决定因子之一——注意这一点,只是其中之一。当然,由宗教所规范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受到在既存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界域中运作的经济政治诸因素的深刻影响。如果我们试图无一遗漏地一一阐明这些相互依赖关系,无疑于巨海操舟,必会迷失方向。在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在那些社会阶层(social strata)的生活行为中起导向性作用的要素离析出来,因为它们有力地影响着这些阶层各自宗教的实践伦理。这些要素将最独特的特征铭刻在诸实践伦理上,从而使各种伦理彼此判然有别;并且,它们同时对于各自的经济伦理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关注焦点仅限于某一阶层。在给一种经济伦理打上独特特征的行为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些阶层,也会随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因而,一个阶层的影响决非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一般而言,人们还是可以确定这样一些阶层,它们的生活方式至少对某些宗教来说,一直起着突出的决定性作用。以下就是人们可能所期望的一些例子。

儒教是俸禄阶层的身份伦理。这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且具有世俗理性主义的特征。一个人若不属于此一文化阶层,则无足轻重。此一阶层的宗教(或许有人欲称其为非宗教的)身份伦理决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远超于此一阶层本身。

早期印度教脱胎于一个世袭的文人学士种姓,他们

远离仕途，只是充当着某种行仪者，以及个人和共同体灵魂司牧者的角色。他们形成了一个以地位分层为取向的稳定的中心，他们将其印迹烙于社会秩序之上。只有受过《吠陀》教育的婆罗门——作为传统的载体——才构成了得到充分认可的宗教身份团体。而只是后来，一个非婆罗门的苦行者身份团体才作为婆罗门的对应者脱颖而出，并与之相抗衡。接着，在印度的中世纪时期，又有印度教加入其间。此乃由社会底层及平民秘仪传授者所持的狂热的、秘仪式救世主信仰。

佛教的宣扬者是拒斥现世、离弃家园、云游四方、整日陷于沉思冥想中的托钵僧。唯有这些托钵僧才是纯正的教团成员；而其余人则是重要性较低的一般信徒：是宗教意识的客体，而非主体。

伊斯兰教初期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勇士——即纪律严明的圣战士骑士团——的宗教。与其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翻版相比，他们缺乏的只是性禁欲。但在伊斯兰教的中世纪，冥思的、神秘的苏菲派(Sufism)在平民阶层的狂迷法师的引导下，至少取得了与之分庭抗礼的地位。由苏菲派衍生的小市民阶级的兄弟团组织，颇有类似于基督教第三教团之处，只不过后者有远为广泛的发展。

自“巴比伦之囚”<sup>②</sup>之后，犹太教就一直是一种市民的“贱民宗教”。我们将会很快地熟悉此词的确切涵义。在中世纪时期，犹太教转而由在典籍和礼仪上训练有素的知识阶层来领导，而这恰恰成为犹太教的一个特色。此一阶层代表了一个越来越准无产化(quasi-proletarian)和理性化的小市民知识界。

最后，就基督教而言，其初出道时，乃是四方漂游，有

一技之长的雇工所持的教义。在其内部发展和扩展的强盛期,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清教主义时期,它一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都市的,尤其是市民的宗教。西方的城市(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和市民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它只出现在西方)一直是基督教活动的主要舞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古代宗教共同体中的圣灵虔修派,适用于中世纪顶峰时期的托钵僧修会<sup>③</sup>,以及适用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诸宗派,直至虔敬主义<sup>④</sup>和循道宗(methodism)<sup>⑤</sup>。

**注释:**

① 本文译自韦伯为其列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这个总标题下的一系列论著所写的一篇导论。此篇导论和《儒教与道教》的第一部分写于1913年。但直到1915年9月才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第41卷上刊出。——英译注

② 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指犹太王国先后在公元前598/597年和公元前587/586年被征服后,犹太人遭大批掳往巴比伦国一事。——中译注

③ 托钵僧修会(mendicant monk order),或托钵修会(mendicants)天主教修会中的一类,这类修会中的修士发守贫愿,靠劳动所得或慈善捐赠为生。托钵修会的两大创始人是多明我会的创始人圣多明我(Saint Dominic 约1170-1221年)和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1181/1182-1226年)。——中译注

④ 虔敬主义(Pietism)17世纪兴起于德国新教信义宗(Lutheranism)内部,注重个人信仰的改革运动。——中译注

⑤ 循道宗(Methodism)基督教的一宗。属于该宗的教会在英国称循道公会,在美国主要为卫理公会,两者十分不同。——中译注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

## 宗教改革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 A. 宗教分裂的政治与宗教原因

极大地改变了教权制地位的宗教改革，显然亦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共同决定。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因素的影响是非直接的。毫无疑问，农民之所以对新的教义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其土地可以从非以《圣经》为正当依据的种种贡租及劳役中摆脱出来，正如今天俄国农民所做的一般。而市民阶层的直接利益仅仅与修道院手工业发生冲突，其他一切则全都是次要的。禁止高利贷从未被当作个问题提出来。

对于这一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由大分裂（1378—1417年）——反过来它亦有政治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议会运动所造成的罗马教皇权威的削弱，而后者进一步削弱了教皇在边远的北方国家中的权力。因为与南方国家相比，教皇权力在北方国家一直比较弱。教皇权威亦因君主和土地贵族阶层反对其干预国内牧师有俸职位的授予及其租税、收费制度而受到了削弱；通过行政管理理性化而大大加强了其权力的君主们普遍持有一种政教合一和世俗化的倾向，加之教会传统在知识圈和贵族、市民阶层的心目中信誉扫地，从而使教皇权威显出了一种颓势。

然而，这些解放的趋向与渴望从宗教生活方式中解

放出来,几乎毫不相干,它们只是与削减教权制的种种限制之愿望有着些许的关联。如果因此而断定一个渴求肯定俗世生活、“个人自由”,甚而至于美与感官享受的社会,会因为教会对这些渴望的敌意,而受到禁锢,那就大谬不然了。事实上,在这方面,教会是无可指摘的。

事实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家相信,宗教通过教权制对俗世生活的渗透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成功,而市民阶层尤其持有此种看法。作为教皇制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手:再洗礼派以及有关的教派,所要求于自己的那种自我克制、禁欲精神和教士纪律(所达致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是教会从未敢苛求信徒这样做的。这恰恰导致了教权制与世俗权力以及与诱发这些权力的罪恶不可规避的妥协。凡是市民阶层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地方,新教之各种禁欲教派则会占据优势地位,而在贵族或君主占上风的地区,则最不主张禁欲的宗教改革运动,安立甘宗(Anglicanism)和路德宗等教会就会盛行。正是具有强烈宗教情绪的市民阶级的这种特殊的虔敬行为使得他们与宗教改革的鼓吹者站在一起,反对传统的教会机制,一如他们早先站在教权制一边,反对皇帝,以及站在托钵教团一边,反对俗世神职人员一般;他们的虔敬行为具有一种比较理性的伦理特征,一种市民阶层的职业性格以及比较强烈地贯注于在神面前的自我辩白。这些特征与如下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与农民生活相比,它更少地受有机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些阶层也许会更喜欢教会内部的改革,而不是教会的革命,如果前者能够满足他们的伦理要求。然而,教权制遇到了某些一下子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这些困难植根于其组织

的历史遗产中，并与具体的权势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经济，特别是政治格局对宗教分裂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人所皆知的，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对终极的宗教动机之极为重要性视而不见。

## B. 路德宗

宗教改革反过来强烈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影响因新的信经的独特性而有所变化的。路德会对于资本主义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持的态度，较之于天主教，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路德对于经济事务的看法是非常传统的，远没有佛罗伦萨的理论家那么“现代”。他的教会是明确地建立在教长的官职卡理斯玛基础上的，其天职是传布福音；其教会对于任何反叛神授权威的做法都持有一种毫不含糊的敌意。路德会最重要的革新（也是在经济方面）是取消了福音的劝诫，这种劝诫超越了俗世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标准；由此，修道院和修道禁欲主义作为对通过好好工作而寻求救赎——起先路德对于这种办法并不赞同——之无用而错误的表达而被废除了。自此以后，基督徒的美德只能在世俗社会秩序，即在婚姻、国家和职业中寻求。确保首要任务，即传布真正的福音的责任，在路德会看来，落到了政治权力的头上，因为教权制以及形成自治的宗教公社的尝试都一一失败了——当然，后者部分地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且因为教会的官职卡理斯玛（作为一种义务性传布圣经的救赎制度）继续保留着。由此产生的政教合一制度因宗教改革时期的巨大世俗化进程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 C. 伦理与加尔文宗

实际上,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福利取向是所有允诺救赎的宗教的共同特征。不过,有两个例外,且彼此之间判然有别:清教主义与犹太教。仅有一个清教徒共同体(广义而言,这构成了一切基本上禁欲的新教群体),就这里所使用的社会学意义而言,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教会,它意味着一种教权制度:加尔文宗。

加尔文会的性质不同于其他所有教会:天主教会、路德会和伊斯兰教会。考虑到我们的篇幅有限,我们不得不以一种直奔主题的方式概述一下加尔文宗的理论。严格的加尔文宗的基本教义:预定论使其否定了接受圣事对于永恒的救赎有何意义。此外,信徒的实际行为与他的命运也是无关的,因为命运是经由神之不可思议和不可变易的意志而被永恒地决定的。这种选择出于其本身的缘故不需要任何教会。其真正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其组织,一如其他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信徒的一切社会义务一样,完全依赖于神的戒律。这种戒律产生的原因是信徒所不了解的,但在《圣经》中作了明确的启示;其细节可以由为此目的而存在的人的理性来加以补充和解释。教会绝非是为了拯救灵魂和罪人的爱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它的唯一目的是增添神的荣耀,亦就是一种冷峻的神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教会不仅为有福的人而存在,而且也为被咀咒者而存在,因此,为了神之更大的荣耀,它会压制罪恶——这是所有人皆有的,因而使一切受造物无可挽回地与神相分离,教会是教鞭,而非救赎的媒介物。任何诉诸于巫术性圣事的行



为都是对上帝之定则的愚蠢冒犯；教会并不处置这种救赎手段。

因而，教会在此被彻底剥夺了其卡理斯玛的性质，而变成一个单纯的社会机构。然而，此一机构的建立乃是一种神法(*divini iuris*)上的义务；其品位高于其他一切机构，而且其组织形式是唯一由神所定的。然而，除此而外，维系教会之义务，究极而言，与维系同样由神所意愿的国家之社会责任，以及与信徒世俗职业中的义务，并无二致。

与其他所有“教会”不同的是：这些义务（在加尔文主义里）并非靠着人为的努力而构成，亦即，并非靠着致力于超越在现世社会诸秩序中完成的伦理、而获得修道士那样的特殊恩宠状态，为其要旨。因为，此种努力在神的预定(*Prædestination*)之前是毫无意义的。信徒的义务在于：一方面于现世的社会诸秩序里，另一方面在“职业”(*Beruf*)里，竭尽一己之力以彰显神的荣耀。

此种“职业”的概念，在所有基督新教的国家里，乃得自于圣经的翻译，在加尔文教徒之间，此一概念则完全明白地包含了得自资本主义企业的正当利润。此种利润及获得此种利润的合理手段，随着加尔文主义首尾一贯的发展——虽然加尔文本人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得到越来越正面的评价：信徒对于被预定得救或沉沦的不可测与不可知性，自然是无法长久忍受的；他必须寻求“救赎的确证”(*certitudo salutis*)，探寻自己乃是被预定得救者的征兆。既然现世外的禁欲已被否定，他只有靠着以下的办法来寻得确定，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乃是严格正直且合于理性地抑制着被造物的一切冲动，另一方